

意大利漢籍的搜集*

高田時雄 撰

趙大瑩 譯

意大利自古以來就與中國有着很深的關係。姑且不論馬可·波羅，僅回顧16世紀末自羅明堅、利瑪竇等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開始，天主教在中國傳教而產生的中國研究，意大利可稱是無可爭議的歐洲中國學的發祥地。但是歐洲的中國學中心後來轉移到法國。近代以來，與英國、德國等國家中國學研究的積極推進相比，意大利則幾乎沒有產生專門的學者。由於意大利完成近代國家的統一較晚(1861)，不能夠從國家角度大力組織充分的中國學研究。但羅馬作為天主教會的大本營，通過傳教士及其支持者——西班牙、葡萄牙王室等贊助的各種渠道，很早開始就有很多文獻傳來，主要是梵蒂岡、傳信部(Propaganda Fide)和傳教修會本部等所傳承下來的文獻。意大利統一國家成立後，佛羅倫薩、羅馬等大學裏設立了中國學講席，講席擔任者們開始大力搜集漢籍。

由此，現在意大利所保存的漢籍可以分成兩大部分：即隨着初期傳教而獲得的明末刻本等古籍和近代以降新意大利中國學講席擔任者們搜集的書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譯者學習、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國家圖書館古籍部

* 譯者注：原文分(上)、(下)分載於 *Eastern Book Review* (244), pp. 2-6, 東方書店, 2001-06, 和 *Eastern Book Review* (245), pp. 2-6, 東方書店, 2001-07。經高田時雄教授授權，譯為中文。此文譯稿經高田時雄教授、法國遠東學院米蓋拉女士和國家圖書館鮑國強研究員的指正，特此致謝。

籍。然而意大利漢籍的搜集，與英國、法國、荷蘭、德國、奧地利圖書館所藏漢籍已經揭示的情況不同，其現狀很少為人所知。筆者在近六七年間，有幸每年赴意大利考察，調查了約20個圖書館收藏的漢籍，因此想把對這些機構漢籍搜集的大體情況加以總結。調查結果的全貌，筆者將與意大利同事共同公佈一個意大利所藏漢籍聯合目錄，這裏主要想介紹意大利漢籍收藏機構及其漢籍收集的情況。

首先，毋庸置疑要介紹梵蒂岡圖書館。梵蒂岡雖然在地理上位於意大利領土內，但政治上並不屬於意大利，所以這裏不作為意大利漢籍收藏機構進行介紹。梵蒂岡圖書館與中國有關的文獻的收集情況，以前筆者撰有短文介紹^①，可能的話請讀者參考。此外，梵蒂岡所藏漢籍已有伯希和編制的簡目（1922），筆者對該目錄進行了補編，基本能夠知道其藏書的整體情況^②。

這裏補充若干與梵蒂岡有關的情況。1622年，格里高利十五世（Gregorius XV）創設的傳信部內，先後收藏了巴貝里尼文庫（Biblioteca

①《梵蒂岡圖書館的中國文獻搜集》（ヴァチカン圖書館の中國關連蒐集について），《日佛東洋學會·通信》第20號（1995年12月），3—6頁。

②伯希和的簡目原稿是打印本，沒有使用漢字，因此很難利用。數年前筆者曾將該目錄改定後，正式編輯出版：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okio Takata,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Reference Series 1, Kyoto, 1995. Tokio Takata, *Supplément à l'Inventair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Documentation Center for Oriental Studies Series 7, Kyoto 1997（高田時雄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叢刊第7冊）。譯者按：此書郭可中譯本，由《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組成，2006年在北京由中華書局出版。

Barberiniana)^①、博爾吉亞文庫(Biblioteca Borgiana)^②等名家藏書,其中的亞洲諸國文獻內含有相當數量的漢籍。這些藏書內早期傳來的藏品不少。博爾吉亞文庫(Borgiana)入藏了全部意大利中國學者安東尼·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所藏的漢籍。19世紀初歐洲中國學草創時期,蒙突奇與雷慕沙^③、克拉普羅特^④等學者一樣活躍。這些書籍在1902年移交給梵蒂岡

① 譯者注:原文Biblioteca Barberiniana,米蓋拉女士補充為:Barberiniani orientali Barb. or.,特此致謝。教皇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 VIII, 1623—1644任教皇)是最後一位用武力擴大領地的教皇,教會藝術的突出貢獻者,教會改革家。他三歲喪父,由叔叔——宗座總書記官(Apostolic Protonotary)佛朗西斯科·巴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撫養,16歲時成為叔叔的繼承人。在叔叔去世後,他繼承了大量遺產,在羅馬購買了一座宮殿,修建成為豪華的文藝復興風格住所。他成為教皇後,大量起用家族成員,先後將他的兄弟大安東尼(Antonio Marcello Barberini, the elder, 1569—1646)、侄子佛朗西斯科(Francesco Barberini, 1597—1679)和小安東尼(Antonio Barberini, the younger, 1607—1671)選為樞機主教。授予他侄子的兄弟塔迪奧(Taddeo Barberini, 1603—1647)諸多頭銜,如帕利斯蒂那王子(Prince of Palestrina)、羅馬地方長官(Prefect of Roma)等。通過這樣的網絡,烏爾班八世建立起了龐大的巴貝里尼王朝。在位期間,他的家族積聚了1億零5百萬斯庫多的財富。其家族的大量藏書形成了巴貝里尼文庫。他任教皇期間,還為耶穌會創立者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和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 1506—1552)封聖;1633年傳喚伽利略到羅馬,勸他撤銷日心說著作;此外1638年發佈教諭,廢除耶穌會對中國和日本的傳教壟斷,允許其他修會和教派到那裏進行傳教。

② 譯者注:Borgiani cinesi Borg. cin. 斯特凡諾·博爾吉亞(Stefano Borgia, 1731—1804),傳信部秘書長,意大利羅馬天主教樞機主教、神學家、文物學家、歷史學家、收藏家。他在韋萊特里創立了一座博物館,並窮其一生收集了驚人的錢幣、手稿(尤其是埃及土語的)、地圖、珍本書籍、紀念章、古代考古文物和藝術品,成為當時最為知名的收藏。博爾吉亞將他的收藏開放給學者研究,無論國籍和種族,均給予大量的支持。博爾吉亞逝世後,他收藏的埃及土語手稿被分開收藏:非聖經類手稿送往那波利,存放在博爾吉亞圖書館(Biblioteca Borbonica),後來稱為維托里奧·伊曼紐爾三世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Vittorio Emanuele III),1860年以後稱為那波利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聖經類手稿,除了錯拿到那波利的部分,與錢幣、紀念物等一起交給了傳信部,形成博爾吉亞博物館(Museo Borgiano)。20世紀初,博爾吉亞博物館的手稿轉交給梵蒂岡圖書館(Vatican Library)。博爾吉亞致力於鼓勵宗教當地語系化和方言禮儀的應用,例如傳信部鼓勵設立中國主教。見Mariano Dias, “Fr. Caetano Vitorino de Faria”, in Teotonio R. De Souza ed., *Essays in Goan History*,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146。對博爾吉亞生平簡介,參見天主教百科全書中的詞條:Paolino da San Bartolomeo, *Vitae Synopsis Steph. Borgiae* (Rome, 1805)。博爾吉亞錢幣、手稿等的收藏,參見Jacob Georg Christian Adler, *Mvsevm cvficvm borgianvm Velitris. Romae*, apvd A. Fvlgonivm, 1782。博爾吉亞藏書的介紹,參見Jörgen Zoega, *Catologus Codicum Copticorum manu scriptorum qui in Museo Borgiano Velitris adservantur*, Rome, 1810以及M. Enrica Lanfranchi Giovanna Granata, *La biblioteca del cardinale Stefano Borgia (1731-1804)*, Bulzoni, 2008。

③ 譯者注: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法國漢學家,法蘭西學院首位漢學講席。

④ 譯者注:朱利斯·海恩里希·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德國語言學家、歷史學家、人種學家、東方學家和探險家。他曾與雷慕沙一起,用批評的方法將東亞學基礎研究轉向科學學科。他的父親是著名的鈾、鉛、銻等元素的發現者——化學家馬丁·海恩里希·克拉普羅特(Martin Heinrich Klaproth, 1743—1817)。

圖書館代管，現在保存在梵蒂岡，其餘的漢籍由繼承傳信部附設學院 (Collegio) 的宗座傳信大學 (Pontificia Università Urbaniana) 收藏。數量頗多，出版年代均為自清末到民國初年，值得看的不多。

除了梵蒂岡，意大利最大的漢籍收藏機構是羅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①。其東方部 (Sezione Orientale) 所藏漢籍有 1500 種 15000 冊，數量上超過了梵蒂岡，並有相當多的珍本。其中有 1837 至 1847 年在中國代牧的羅類思 (Ludovico de Besi, 1805—1871) 帶來的劉文泰《本草品匯精要》彩繪抄本等為代表的漢籍^②。意大利在 70 年代做了部分複製，幾年前日本將全冊影印出版^③。

實際上該圖書館是在意大利統一後，接收了作為耶穌會學院的羅馬學院 (Collegio Romano) 圖書館的文獻。因此耶穌會留存下來的古籍大多藏在這裏。如果我們要調查耶穌會在中國刊刻書籍的情況，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梵蒂岡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機構一樣，不失為重要的收藏單位。今天，耶穌會本部設立了檔案館 (ARSI: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衆所周知，其中保存了耶穌會海外傳教有關的大量檔案，自利瑪竇開始的耶穌會士們的重要報告、書信，都有保存，其中有少數漢籍混入其中，數量不多。這些漢籍最後轉歸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

該圖書館漢籍來源不僅僅是耶穌會羅馬學院。其他派別修會，例如屬於方濟各會的阿拉科埃里聖母瑪利亞教會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in Ara Coeli) 舊藏，也常常能夠見到。方濟各會對在中國出版的書籍的系統研究依然不存，像這樣現存的資料亟待整理。

該圖書館也收藏從教會以外流入的漢籍。以日本文學為中心，在羅馬大

① 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的漢籍收集情況，參看該圖書館的東方部主任 Marina Battaglini 女史著《國家圖書館東方收藏：中日藏品》，載於《圖書館研究論文集——起源，過程和故事》(“I fondi orientali d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le collezioni cinese e giapponese”, *Le fonti, le procedure, le storie: raccolta di studi della Biblioteca*, 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1993, pp. 35-44)，以及同著者的《漢文古籍：重拾一份被忽視的遺產》，載於《明清研究》(“Old Chinese Books: Reclaiming a Neglected Heritage”, *Ming Qing Yanjiu*, Napoli-Roma, 1996, pp. 13-27)。以上兩文，概括了意大利漢籍搜集的整體要點。

② 詳見 Giuliano Bertuccioli,《記〈本草品匯精要〉》，《東方研究雜誌》第 29 卷(“Nota sul Pen-ti's'ao P' in-Hui Ching-Yao”,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Vol.29 (1954), pp. 247-251)。

③ 東京：科學書院，1997 年。

學講授遠東語言文學的汪瑟士(Carlo Valenziani)^①所藏日籍、漢籍,在他去世的1896年,分幾次由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購入或接受寄贈。同樣在羅馬大學講授中國學的諾全提尼(Lodovico Nocentini)^②在義和團事件之際,將意大利軍隊擄掠的約6000冊漢籍交至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這是他對該圖書館極大的貢獻。這些書籍中有很多裝幀精美的殿版書,上面還殘留着軍靴踩踏過的痕跡,讓人感到歷史的悲哀。諾全提尼後來把西德二郎著《中亞細亞紀事》(1886)一書翻譯成意大利語^③。同樣在義和團事件中獲得的戰利品,即保存在北京意大利領事館的2600冊漢籍,經由當時領事館的通譯韋大利(Guido

① 譯者注:汪瑟士(1831—1896),生於羅馬,羅馬大學法學專業畢業。他有很强的語言能力,尤其擅長法語。30歲左右,汪瑟士對中文和日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刻苦學習。儘管沒有去過中國和日本,但他卻能以一口標準的官話與中國外交官交談。1876年,汪瑟士被選為羅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的教授,研究特長是日本語言文學。加入林賽研究院後,他發表了很多論文,使歐洲人了解了遠東的文明。在日本,汪瑟士教授非常出名,他與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Ito Hirobumi)關係非常好。日本人感謝他讓歐洲了解了日本,授予他“瑞寶章”(Sacro Tesoro)。瑪麗娜·巴達里尼(Marina Battaglini)研究指出,1877年3月,羅馬大學圖書館接受汪瑟士的建議,從他的私人藏書中購買了第一批中文圖書。而汪瑟士本人的收藏大約包括450種中文和日文書籍,以及750種關於遠東的西文著作。1881年他被授予“中文和日文書籍榮譽收藏者”稱號。1902年,圖書館接受了汪瑟士遺孀出售的最後一批圖書。見瑪麗娜·巴達里尼《卡羅·瓦蘭齊亞尼收藏的漢學研究的詞典及圖書》(鄒雅艷譯,《國際漢學》第20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222—223頁。該文附錄有關於漢學研究的29部詞典和54部漢語語法書籍和手冊清單,226—234頁。)

② 譯者注:諾全提尼(1849—1910),意大利漢學家。1883年,諾全提尼被意大利政府派往中國留學,同時在意大利駐上海領事館做翻譯。他在領事館工作了5年後返回意大利,於1899年成為羅馬大學漢語專業的第一位教授。參見馬西尼,《意大利漢語教學與研究概況》,載於《世界漢語教學學會通訊》2009年2期,6頁。關於諾全提尼的研究成果,有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在《通報》1894年第5卷第3期發表的諾全提尼著《中國人發現美洲》的書評(“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attribuita ai Cinesi by Lodovico Nocentini”, *T’oung Pao*, Vol. 5, No. 3 (1894), pp. 291-298)。諾全提尼再版了耶穌會士Giuliano Baldinotti(1591—1631)1626年11月12日發自澳門的關於中國的通信報告,即“*Il viaggio del. P. G. Baldinotti al Tonchin nel 1626*”, *Rivista d’ Italia*, a.VI, Vol.I, Fasc. 3-4, marzo-aprile 1903, pp. 423-430。瑪麗娜·巴達里尼前引文也指出,諾全提尼在汪瑟士之後擔任羅馬大學主講教授並繼承“榮譽收藏者”稱號,他繼續書籍的整理工作,同時致力於豐富中文藏書的工作。1901—1903年期間,圖書館收集到意大利駐北京公使館裏的來自意軍駐京司令部的中文圖書。諾全提尼將汪瑟士藏書、羅馬學院圖書館收藏的與中國和日本有關係的耶穌會傳教士書籍,以及從羅馬書市和私人處購得的圖書進行整理,將東方語言寫的書和西方書加以區分,為西文書做了一個新的書目,直至他1910年去世。見《卡羅·瓦蘭齊亞尼收藏的漢學研究的詞典及圖書》,223頁。

③ 西德二郎《中亞:一個日本外交官的遊記和研究》(Tocugirò Nisci, *L’ Asia Centrale. Note di viaggio e studi di un diplomatico giapponese*, Torino, Unione tipografico editrice torinese [UTET], 1911)。榎一雄,《中央亞細亞旅行記》,《アジヤ旅行記》,《榎一雄著作集》第二卷,東京,1992年,426—428頁),原載《日本古書通信》453號(1982年1月)。

Vitale)^①的斡旋，入藏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後來韋大利在那波利東方大學教學。他們都是意大利新時代的中國學者^②。

羅馬中央圖書館所藏漢籍之中，時至今日仍然能引起興趣的是南音和廣東俗曲類的小冊子收藏品。這批藏品合計約一百幾十種，因為同一種書有複本存在，所以有350餘冊。大多數是廣州廣文堂出版的小薄冊子，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嘉慶年間，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的此類文獻資料。如果可能的話，筆者希望可以將其中早期版本的細目公開於世。

如上所述，羅馬中央圖書館原來是耶穌會的羅馬學院。1873年意大利統一，依據法律解散了修道會機構，將其經營的圖書館編入國立機關。卡薩納特圖書館(Biblioteca Casanatense)也不例外。此圖書館是樞機主教卡薩納特(Girolamo Casanate, 1620—1700)所創設，附屬於多明我會修道院。該圖書館很早就開始對一般人開放，並且勤於擴充藏書和整理目錄，因此在18世紀後半期便發展為僅次於梵蒂岡的羅馬最大的圖書館。該館藏有日本基督版《救世主》(さるばとる・むんぢ, *Salvator Mundi*, 長崎1598年版)、《聖教要理》(どちりな・きりしたん, *Doctrina Christiana*, 長崎1600年版, 日文版)。與中國有關的文獻，保存下來的主要是傳信部派遣到廣東教區的龐克修(Giuseppe

① 譯者注: Baron Guido Amedeo Vitale (1872—1918), 意大利外交官、語言學家。他在那波利東方大學學習漢語，於19世紀90年代赴華，在北京意大利公使館做翻譯。1899年，晉升為二等翻譯。韋大利娶了一位中國女士為妻，並育有四個孩子。在北京生活期間，他對中國民間文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尤其在民間故事和民間歌謠方面。他開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並編成兩部書：《北京歌謠》(*Pekinese Rhymes*, Beijing: Pei-t'ang Press, 1896)、《中國故事》(*Chinese Merry Tales*, Pei-t'ang Press, 1901)。參見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 18)。1914年他回到那波利教授漢語言文學，1916—1917年擔任那波利東方學院主任。

② 包括以上幾任的意大利中國學歷史，參見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漢學研究在意大利：1600—1950》(“Gli studi sinologici in Italia dal 1600 al 1950”, *Mondo Cinese*, n.81 [marzo 1993], pp. 9—22)。英文版在寒山堂出版的倫敦1995年歐洲漢學史國際會議論文集集中發表(“Sinology in Italy 1600-1950”,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1995, pp. 67-78)，據此可知其要。另可參見Angelo de Gubernatis，《意大利東方學研究史資料》(*Materiaux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en Italie*, Paris-Florence-Rome-Turin, 1876, 367ff.)

Cerù)^①留下的部分文獻、巴黎外方傳道會的安當·吉涅(Antoine Guignes, 1704年出發來華,生卒年不詳)藏書,以及同為巴黎外方傳道會神父的主教顏璫(Charles Maigrot, 1652—1730)、教皇特使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的寄贈書。他們都對耶穌會士的適應主義提出強烈非難,是歷史上著名的“禮儀之爭”的當事人。這些藏書中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版本,反而是天主教中國傳教史非常有趣的資料。最近,該圖書館所藏漢籍的目錄公佈^②。

同樣作為奧古斯丁會圖書館的安傑麗卡圖書館(Biblioteca Angelica),與中國有關的貴重資料很少,能稱得上是“漢籍”的只有嘉靖辛亥年(1551)刊本《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續資治通鑑節要》一種^③。

意大利有幾個國立圖書館,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除了羅馬,佛羅倫薩也有“國立中央圖書館”。不過該圖書館只有二十種漢籍,比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量少很多。佛羅倫薩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少量漢籍之中,有名的是佛羅倫薩出生的大旅行家法蘭西斯科·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 1573—1636)^④舊

① 譯者注:龐克修(1674—1750)。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1712年10月23日)的滿文奏折中在說明教皇來信事情經過時,提及龐克秀的名字(《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823—824頁),韓琦考證此人應為“龐克修”,見氏著《姍姍來遲的“西洋消息”——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吳志良等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477頁及481頁注1。

② 梅歐金,《卡薩納特圖書館(羅馬)及其中國文獻》,《中西文化交流雜誌》第22期(Eugenio Menegon, “The Biblioteca Casanatense (Rome) and Its China Materials”,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 (2000), pp. 31-55)。

③ 不全,只存卷十九、二十。羊皮裝。

④ 譯者注:佛羅倫薩商人和旅行作家。1671年他逝世後,著作《印度等國旅行見聞述評》(*Ragionamenti sopra le cose da lui vedute ne' suoi viaggi dell' Indie occidentali come d' altri paesi*)在佛羅倫薩出版。1701年馬戈羅蒂(Magalotti)撰文介紹了法蘭西斯科·卡萊蒂在1594—1606年的環球旅行,尤其是他的那些故事:關於聖地亞哥奴隸市場,在那裏,他討價還價買了75個奴隸,表達了當時佛羅倫薩人的種族觀;他在墨西哥城一年多的停駐;馬尼拉的大火燒掉了他積累的所有財富;驚人而可怕的(對他而言)菲律賓人的性生活;中國和日本的奇特之處;在澳門他被葡萄牙人監禁;他在果阿的生活;危險的歸程,通過里斯本和巴黎,最後抵達佛羅倫薩。他於1609—1636年撰寫此書,至出版之時,大多數書中提及的地方和風俗都已經為意大利人所瞭解;但是此書以優美、典雅的散文修辭,關注細節的生動描繪,以及商業貿易的焦點視角,成為當時非常有價值、有見解的作品,修正了巴托利(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根據耶穌會士資料撰寫的著作。(參看《牛津意大利文獻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Italian Literature*; Niccolò Rinaldi, *Oceano Arno. I navigatori fiorentini*. Firenze Libri, Firenze 2012)

藏的萬曆二十三年(1595)刊汪縫預等著《廣輿考》^①。其他可以納入善本範疇的有嘉靖三年(1524)司禮監刻本的全本《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和明刻本的《農書》(只有《農器圖譜》)。

那波利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Vittorio Emanuele III di Napoli)與佛羅倫薩國立圖書館藏漢籍數量大約相同。帶有“書林拱秀堂劉蓮台梓行”牌記的《周易本義》，使用了令人驚歎的摩洛哥羊皮裝幀，這本書出自名門范尼斯家族(Farnese Family)^②，其紋章壓印在書皮上。此書也許以前經西班牙而來。這些漢籍曾由米歐拉(A. Miola)編目，該館存有他手寫的目錄稿本^③。

此外，米蘭的布雷斯頓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④、威尼斯的聖馬可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中也藏有為數不多的漢籍。前者有萬曆本《古今列女傳》等古籍。後者之中沒有見到漢籍，但是有一些滿文書^⑤。其中一件帶有威尼斯著名多語言學者埃米利奧·泰扎(Emilio Teza)^⑥的收藏印，也許是他個人舊藏的滿文書。

① 卡萊蒂及其旅行的詳情，請參見榎一雄《商人卡萊蒂》(商人カルレッティ)，《榎一雄著作集》第六卷，東京，1993，3—215頁。該文首先在《絲綢之路月刊》(月刊シルクロード)第5卷第7號(1979年9月)至第6卷第9號(1980年11月)連載，之後於1984年10月由大東出版社刊行單行本。對《廣輿考》的相關研究，可以參照榎一雄書第101頁引用的海野一隆、穆喬利(Markcello Muccioli)二人的研究。

② 譯者注：范尼斯家族以教皇保羅三世(1468—1549)為代表，他於1534—1549年任教皇，期間經歷了洗劫羅馬事件(sack of Rome in 1537)和新教改革所帶來的對天主教會的各種質疑。一系列新的天主教派創立並吸引了很多信眾，如耶穌會。他召集了1545年的特倫托公會。他任用家族成員強化權力並積累了大量財富，影響達百餘年。據高田時雄教授相告，這批藏書應該是其家族後代收集的。

③ Alfonso Miola,《那波利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目錄》(Catalogo dei Mss. Orientali della Biblioteca Naz. di Napoli, 1877)。

④ 該館的漢籍目錄，早有朱塞佩·海格(Giuseppe Hager, 1757—1819)編制的《米蘭皇家圖書館漢籍目錄》(Catalogo de' Libri Cinese della Biblioteca Reale di Milano, 未刊稿本)。

⑤ 意大利所藏滿文書，有史達禮所著的聯合目錄，其中囊括了這些滿文書(Giovanni Stary, *Opere Mancesi in Italia e in Vaticano*,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85)。

⑥ 譯者注：埃米利奧·泰扎(1831—1912)，意大利語言學家和翻譯家。曾是威尼斯馬爾恰那(Marciana)聖馬可圖書館和佛羅倫薩勞倫茲圖書館的館員。後來在意大利的幾所大學教授古典文學和東方文學。1860年擔任博洛尼亞大學印歐語言學教授，是卡杜奇(Carducci)的好友和同事。在任期間，除了完成一些語言學著作，他還參與了多部名著的翻譯，其中有德語(歌德 Goethe、海涅 Heine、格羅斯 Groth)、英語(柯勒律治 Coleridge)、塞爾維亞語、俄語(普希金 Puškin)、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肯塔爾 Antero de Quental)和梵語(伐致訶利 Bhartṛhari)。1891年他成為林賽研究院的校董之一。在帕多瓦和羅的城各有一條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西西里地區的中央圖書館(Biblioteca Centrale della Regione Siciliana)以藏有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的《中國之智慧》^①(*Sapientia Sinica*, 建昌 1662 年出版)和《中國之政治道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廣州 1667 年, 果阿 1669 年出版)^②著稱。但是漢籍很少, 不值一提。

佛羅倫薩的梅第奇·勞倫茲圖書館(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是著名的梅第奇家族圖書館。文藝復興時期創建, 世代相傳, 圖書館古書庫中也有一些早期舶來的漢籍收藏。崇禎刊《宣和博古圖》(全三十卷, 只存十四卷)、萬曆富春堂刊《大觀本草》(只存卷二十三)、以及明末刊《文公家禮儀節》(全八卷, 存卷五至卷八)尤其引人注目, 而崇禎六年忠義堂刊《新選合併明朝三春演義大全》則因未見其他傳本而更加珍貴。

設有中國學講座的大學或多或少都藏有中文書。但是歐洲諸國中, 意大利是確立近代中國學研究相對較遲的, 有組織地搜集圖書比較困難, 因此民國以降的出版物、尤其是算得上是漢籍的綫裝本古籍非常有限。但也不是沒有通過之前各種途徑流入大學圖書館的典籍。

大學圖書館之中, 藏有漢籍最豐富的要數羅馬第一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La Sapienza”)。其文哲學院(Facoltà di Lettere e Filosofia)之東方學系(Dipartimento di studi orientali)中藏有數百部漢籍。全部是同治、光緒等清末刊本, 大多數帶有諾全提尼的藏書印。也許在該校執教的諾全提尼的舊藏書都收入這裏了^③。諾全提尼是 1883 年至 1888 年作為意大利外交部實習通譯在中國停留, 應該是那時購買的。不過遺憾的是, 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怎麼利用這些書籍, 因此對這些書籍沒有充分的管理。

那波利東方大學(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與中國的關係由來已久。由教廷傳信部派遣、於 1711—1723 年在中國的馬國賢神父

① 譯者按: 即《大學》全部及《論語》的部分內容的拉丁文譯本。見周振鶴, 《四書的西譯》, 《東方早報》2004 年 6 月 8 日。

② 即《中庸》中文—拉丁文對照譯本, 該譯本是一項集體勞動的成果, 主譯者署名殷鐸澤, 另有 16 人作為監督人和評閱人列名其上, 國籍包括意大利、葡萄牙、法國與奧地利。有趣的是該書一半在廣州印刷, 另一半則於兩年後在印度果阿印刷。見周振鶴, 《四書的西譯》, 《東方早報》2004 年 6 月 8 日。

③ 譯者注: 諾全提尼繼汪瑟士之後, 整理羅馬大學的藏書, 參見 126 頁注②。

(Matteo Ripa, 1682—1745), 1732年在那波利創立了中國學院(Collegio dei Cinesi),即那波利東方大學的前身。該校教授中國人天主教,旨在推進中國傳教活動的同時,支援那波利王國向東方的經濟輸出。之後歷經各種變遷,再次成爲意大利東方學教育研究的基地,活躍至今。可惜的是,所藏古代漢籍很少,不超過50種。

此外,大學圖書館之中的佛羅倫薩大學圖書館(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di Firenze)、熱那亞大學圖書館(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di Genova)、博洛尼亞大學圖書館(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di Bologna)藏有若干漢籍。

佛羅倫薩在意大利統一之後,1871年即組織成立了東方研究協會(Società italiana per gli studi orientali)。此後,先後更名為東方學院(Academia orientale)、亞洲協會(Società asiatica)等,藏書歸入今天的佛羅倫薩大學。現在保存的漢籍、滿文書等加起來不足30種,筆者以爲應該是大量藏書都散逸了^①。比較重要的是崇禎八年(1635)刊《陰符經解》。

熱那亞大學圖書館中藏有十幾種耶穌會在中國出版的書籍,全部是17世紀前半葉的古籍。其中混有萬曆刊日用類書《格物全書》等。對於藏書情況,筆者尚未進行深入的調查,但無疑與耶穌會有關。

博洛尼亞大學藏有不足20種的漢籍,是以擅長多種語言聞名的樞機卿朱塞佩·加斯帕爾·梅佐凡蒂(Giuseppe Gaspare Mezzofanti, 1774—1849)的舊藏書。不過全部是天主教有關書籍的漢譯本,基本是19世紀以降出版的^②。

最後來看一下研究所和博物館藏書。首先是林賽研究院圖書館

① 佛羅倫薩的亞洲協會購入了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搜集的滿蒙藏語文獻,藏品比較豐富。參見諾全提尼,《意大利漢學研究》,《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新系列,第20卷(L. Nocentini, “Sinology in Ital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XX (1885), p. 161)此文的日文譯本爲《伊太利における支那研究》,《書香》第15卷第9號,1941年。

② 梅佐凡蒂的漢籍搜集,見阿爾巴內塞,《梅佐凡蒂基金會和博洛尼亞大學圖書館對館藏中文資料和漢學研究的初步調查》(Andreina Albanese, “Indagine pre-liminare sul materiale cinese e di argomento sinologico del Fondo Mezzofanti della Biblioteca Universitaria di Bologna”, 載於 G. R. Franci, *La Benedizione di Babele*, 1991, Bologna, pp. 173-197)。

(Biblioteca dell'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e Corsiniana)^①，其中與基督教有關的漢籍約有20種。此外也混入少量如萬曆年間新賢堂張岳刊《周易本義》等基督教以外的古籍。

接下來是印度中東亞研究所(IsMEO)，近年改為非洲·東方研究所(IsIAO: Istituto Italiano per Africa e l'Oriente)。該圖書館中有約百種漢籍，不過古籍很少。包括著名的藏學家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的舊藏書。

國立路易吉·皮戈里尼史前和民族誌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Preistorico Etnografico Luigi Pigorini)、地理學協會(Società Geografica)也有若干漢籍，但是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最引人注目的卻是齊索內東方藝術博物館(Museo d'Arte Orientale Edoardo Chiossone)。該館有以明治引進的外國人、收藏家知名的齊索內的日本美術藏品。據說這裏有很多漢籍，數年前筆者前往調查。美術館中藏有齊索內的舊藏書約150種，筆者逐一查看了數百冊漢籍，這些全是德裔美國人金楷理(Carl Kreyer, 1839—1914)的藏書。金楷理作為浸信會教團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其後在江南製造局從事翻譯工作，進而在柏林中國領事館等處任職。作為洋務運動時期翻譯西學的外國學者，與傅蘭雅(John Freyer, 1839—1928)和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一併稱道，也因之而留名。此人的藏書流入美術館的過程，由於相關文獻闕如，不得而知。但是這批收藏中有金楷理所寫的未刊譯稿，是筆者非常感興趣的資料。其中一定有可以知曉此人經歷的重要資料。毫無疑問，這是意大利的漢籍搜集中與眾不同的地方。

以上將意大利漢籍收藏的圖書館逐一舉例，並未詳細介紹。最後還是以一個具有意大利特色的例子來作為本文的結束。筆者在海港利沃諾(Livorno)的市立圖書館(Biblioteca Labronica F. D. Guerrazzi)看到一部書，帶有“正德十三年歲在戊寅春黃氏集義書堂校正新刊”牌記的《類編曆法通書大

① 該圖書館在研究院固有的藏書之外，還收藏有原科爾西尼圖書館(羅倫佐·科爾西尼, Lorenzo Corsini)，即後來的教皇克萊門十二世(Clemente XII, 1730—1740)的藏書為基礎)的藏品，以及利昂·斯特尼藏品(塞爾莫內塔大公, Leone Caetani)，也收藏有少量漢籍。該館目錄有《林賽研究院圖書館所藏日文、中文手稿和印本目錄》(G. Vacca, *Catalogo delle opera giapponesi e cinesi manoscritte e stampate conservate nella Biblioteca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Roma, 1912)。

全》。可惜此書三十卷本中只殘存卷二十到三十，是意大利漢籍搜集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然而該圖書館的中文書除此以外再無其他。當然，單單這部書能流傳到今天，就頗有意思，特別可能是在所謂“意大利”國家中的偶然發現。雖然在意大利無法看到國際水準的大宗漢籍收藏，筆者卻期待可以在某個圖書館搜到一些成果。